

蔣復璁與圖書館事業（七）

蔣復璁口述
林淑蘭筆記

中央圖書館在抗戰中渡過了一段艱辛的歲月，雖然設館工作正值戰亂時期，但我一點也不敢鬆懈，我認為不管是平時或戰時，機關團體都有其工作進度，正和個人一樣，隨時要動、隨時工作，這樣才有前途，否則就不會進步。

廿七年初我剛和百里叔赴德國訪問回國，早先在川東租屋辦公，廿八年重慶戰況漸漸激烈，轟炸連連，於是遷移到江津縣白沙鎮鄉間，在那兒作圖書館編目的工作，同時在鎮上借了一個房子當作閱覽室，開放民間閱覽。而重慶方面我的辦公室設在聚興村上清寺的一個弄堂房子內，以便對外聯絡，和出版品國際交換處，這樣籌備館務的工作不致中斷。

被任命為首任館長

廿九年中央圖書館在重慶建館落成，廿九年七月結束了籌備處的工作，正式成立中央圖書館，我被政府任命為首任館長。由於我早在籌備時候就做好多項準備工作，無論是經費、

圖書、人員，都為國家圖書館事業作長遠打算，所以正式成立時，組織上只不過換了一個名義，但人員工作就早進行齊備了。在這期間我時常往來白沙和重慶之間，長江裡有一個地方叫做小南海，這個區域非常危險，開館之時在卅年二月間舉辦了一星期的展覽，每次重慶有重要展覽，我都從白沙運到重慶去，因為重慶在此之前曾遭受大轟炸，為安全起見，圖書大多放在白沙，所以每次運書展覽，我都是親自監運，不敢掉以輕心。

早先在重慶時，有好幾次轟炸時，我都將書帶到防空洞，如果轟炸書毀我也毀了，每次我總是和書在一起，生死與共的。所以運書自然更是戰戰兢兢，由我自己帶著才放心，渡小南海是非常危險的，想到重慶轟炸時曾和圖書生死與共，這危險又算得了甚麼。

因為在歐洲考察與薛光前先生曾被百里先叔派為秘書，回國後我受先叔之託將報告面呈蔣公，所以和蔣公會談過些話，中央圖書館成立開館後經常舉辦學術會議，每次蔣公

來總是由我陪著，他對我印象就是從這時候開始。

由於先總統蔣公多次到中央圖書館來，每次都由我陪著，所以他對中央圖書館的情形很了解，尤其他曉得我在抗戰時艱苦的情形。後來政府遷台，在南海路興建中央圖書館的筆路檻樓的情形他都很了解，之後我由圖書館轉到故宮博物院當院長，沒有任何人推薦我，因為蔣公對我十分了解，特別交付我另一個重大責任。

收購善本冒險赴滬

中央圖書館在開創之時備嘗艱辛，充實圖書館內容是最重要的事。廿九年重慶房子造好了，中央圖書館即將開館，歷代藏書世家的善本書正是館內急要收藏徵集的，以圖書館的薄弱經費是很難收集到善本書的。但抗戰時有許多淪陷區內的舊家世族因為生活困難，祖先流傳下來的珍藏圖書無法守住，而流入了坊間市面。於是在上海一帶的有心人士便寫信給中英

庚款董事會和教育部，希望政府趕快收購，以免這批書流落到國外去。上海暨南大學校長何炳松、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更是熱心，函電教育部部長陳立夫先生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的董事長朱家驊先生，請他們務必籌款收購，如不馬上進行，這批善本書恐怕會流失海外了，以後要買就十分困難了。

當時中央圖書館還有一筆一百五十萬元的建築費留在中英庚款董事會裡頭，恰好這時候正開始通貨膨脹，物價上漲，朱家驊先生認為如果等到戰後這筆錢便不值錢了，再不好好的利用，以後就貨幣貶值，買不到什麼好書了。因此，他建議上海既然有這些善本珍藏，不如挪用這筆錢去買書，一來不致使這批書流落到外國去，中國文獻落到國外去再找就難了，另一方面好好利用即將貶值的經費，這是一個機會，不能再躊躇的。由於當時的教育部長陳立夫先生正在外視察，事情又相當緊急，於是教育部次長顧一樵和朱家驊便要我到上海淪陷區去收購這批善本書。

說句老實話，那時候上海還是相當危險的。日本人發現我方的人員便會抓起來。我先由重慶飛到香港，在當地和中英庚款董事會的葉恭綽先生接洽，請他在香港負責採購廣東流失的書籍。而在我離香港往赴上海的途中，發現有人跟蹤，好像是敵偽方面的特工人員，於是改了姓名冒險到了上海。抵達上海後，我和何炳松、張壽鏞商量，請他們負責收購京、滬、平、津一帶散出的圖書，錢我不負責，而由

中英庚款董事會直接匯了過去的。

我是在民國廿九年農曆十二月廿三日大冷的冬天離開上海的，我在上海總共待了九天，那時我本想回家一趟，但公事要緊辦完了就急著走了，雖然家在上海卻沒有回去，我廿三日離開上海，廿四日日本特務機構派人到我家抓我，他們不知道我到上海做什麼，凡是重慶國民政府來的人都要抓起來訊問偵查。還好我沒有在家過年，否則便難逃劫難了。

我買了十幾萬冊書，除了動用建築費用外，教育部也撥款二百萬元。今天中央圖書館的善本書便是當時所收購的。我在上海收購的書，由上海寄到香港，再由香港用飛機運至重慶，因運費太貴，我花不起這筆錢，於是以後在上海買的書，用郵包寄到香港。我在香港大學設立一個辦事處，請那時香港大學教授馬季明幫忙主持。不久，香港陷於危機快成淪陷區，爲了維護這批圖書的安全，徵求我國當時駐美大使胡適博士同意，希望由香港運寄我駐美大使館，請他幫忙將這批書暫時寄存在美國華盛頓國會圖書館內。

合浦珠還兀是奇蹟

沒想到正在香港準備寄出的時候，民國卅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件發生了，香港淪陷了。爲什麼在香港耽擱了三個多月左右？當時陳立夫先生擔任教育部長，我向他請示，美國當然是靠得住，但爲了標明起見我們還是蓋個章比較好，立夫先生也同意這樣做。但上海在敵偽

環伺下，我們不能蓋中央圖書館的章，所以只好在香港蓋章以便識別。結果我們一蓋就蓋了三個月的章，就誤了船期，香港在書還未運走就淪陷了。一百多箱的善本書於是被日本海軍拿走了，但後來這批書竟一本也沒遺失掉。

抗戰勝利之後，我曾到處找書，新加坡、澳洲、太平洋一帶全都找不着。有一天教育部前次長顧毓琇告訴我，他在戰後到日本帝國圖書館參觀時，發現上面有中央圖書館館藏的章，原來正是那時下落不明的書。日本政府於是全部歸還給我們。這批書，從上海寄到香港沒丟掉一個郵包、一本書，到了香港被日本人運回日本，再從日本拿回來也沒丟掉一本，還是從香港原來的箱子裝回重慶，這一百多箱書完完整整的，合浦珠還，這可說是個奇蹟。今天中央圖書館內原來的箱子還留存著。香港幾十萬冊的善本書也跟著我由南京搬到台灣。今天中央圖書館內的明本善本書是我到上海去買的，我冒著生命的危險去的。這不管在我個人的圖書館事業來說，或我個人的生命裡，都可以算是一件大事。

所以我得到一個結論，譬如說抗戰期間，重慶的圖書館在烽火漫天中，飽受轟炸之苦，但只有一個彈片掉下來，誰也不敢去拿，我私自出了十塊大洋請工人取了下來。每次轟炸時，我將書帶到防空洞裡去，書沒受到任何損傷。因此，我相信，凡是做事爲國家毫無私心，是沒有困難的，我雖冒著生命危險到上海收購善本書，卻沒有遭到什麼意外，而買了十幾萬

冊最好的書，就是今天中央圖書館內最基本、最重要的明本善本書。這件事是世界圖書史上有記載的，是衆所皆知的，這也算是我自己一生中的大事。

目前中央圖書館藏書最大的特色就是善本書。所謂「善本書」是指我國明代和明代以前刊刻或手抄的珍藏善本古籍，以及近代的精刻、精印、批校本圖書而言。今天十二多萬冊的善本書，尤其以明代資料最爲豐富，而出版的「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三冊，也就是當年採購的收穫。

勝利返滬接管文化事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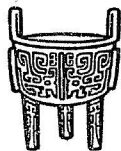
抗戰勝利，那時的教育部長朱家驊，派我到上海作上海京滬區的特派員，要我管江蘇、浙江、江西、安徽等省有關文化的事，我本來是不想去的，後來我答應了，是想了解戰時在敵後所買的書是否還存留著，這才是我較關心的。我真正要管的是南京和上海兩個區域。因爲各省都有教育廳、局，況且我也忙不過來。

我辦理接收淪陷區的教育，非常的簡單，第一件事便是，私立學校除敵偽關係外，其他不管，而當時的敵偽學校都已關了門了，因我們抗戰勝利，他們也就離開了。第二是，這兩區的中等以下學校的教育，交由地方教育機關管，我是不管的。三是我只管大學和學術機構，專科以上的學校由原來的校長推薦，我接收了交給他們自己辦，也等於各校自己接收。因爲，我的辦法很簡單，別人辦了一、二

年才辦完，我三個月就結束了，辦得相當快。我沒有汽車，仍是坐三輪車，也沒有自己的三輪車，當時有所謂「五子登科」之說，我沒有房子、沒有車子，我仍住在中央圖書館裡，依然以館爲家，沒有個人的享受。

這件事雖與圖書館沒有直接的關係，但也由此可以看出我急著辦好中央圖書館，因爲我正積極打算在抗戰勝利後，將中央圖書館的書集中起來。

我替國家做了三個月的特派員，同時也收集了一百多萬冊的書，書很多但缺乏一個大房子，因爲屋宇的建築由於抗戰而停頓了，勝利後經費用以買書和挪做其他用途而無法進行。當時中央圖書館的書愈來愈多，原有館舍不敷使用，所以在台灣復館時，我就以籌設圖書館建築爲第一要做的事，因爲書有了，獨缺房子，而沒有房子就不用談。在台復館的南海路中央圖書館，是我經歷千辛萬苦，只花費三百多萬新台幣建造的，所以南海路原中央圖書館現址要改造歷史博物館，我是有點感情而大表反對，這是我辛辛苦苦籌設建造的，即再過廿年，還是很不錯的房子，如果今天蓋造的話，起碼得花上好幾千萬元新台幣。



宋代史事質疑

林天蔚著

二十四開本 二三〇頁

定價新台幣 一〇八元

本書共分七章，亦即宋史中七事之質疑，如公使庫、公使錢與公用錢之分別，君權與相權的問題，王安石和司馬光之爭，並爲王安石辨誣二事，南宋強幹弱枝問題，義理與時勢之爭——和戰的問題等等，均係宋史上重大而有爭議之事，本書對其中可疑、謬誤、曲解之處，一一考證，剖析精微，而立論公允，別具創見，爲近年之宋史研究佳作。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